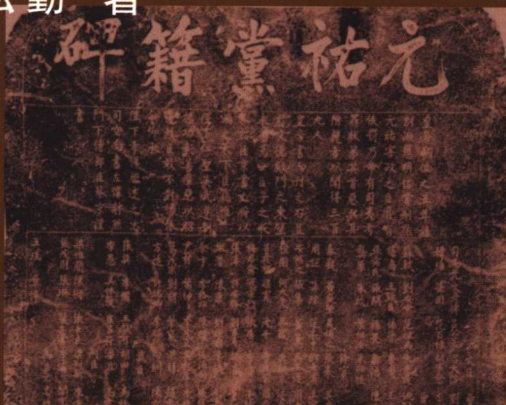


南宋

文人与党争

沈松勤 著

Nansongwenrenyudangzheng



人民出版社

南宋

文人与党争

王内史 著



中国历史与地理知识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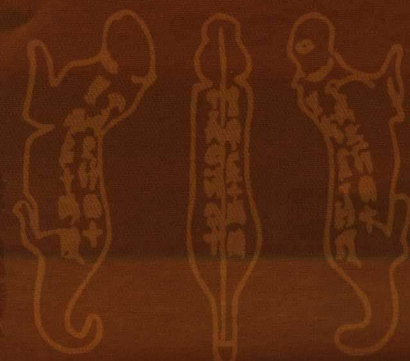
中国历史与地理知识丛书

沈松勤 著

南宋 文人与党争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秀平 关宏

装帧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宋文人与党争/沈松勤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

ISBN 7-01-004616-6

I.南… II.沈… III.政治斗争-史料-中国-南宋
IV.K24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7903 号

南宋文人与党争

NANSONG WENREN YU DANGZHENG

沈松勤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永恒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7.25

字数:40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01-004616-6 定价:38.00 元

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基金项目、浙江大学“十五”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与江南文化”研究丛书。

引 论

作为北宋文人的延续,南宋文人也是以参政主体为主要角色的,多数还具有了参政主体、文学主体、学术主体三而合一的复合型主体特征;作为南宋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朋党之争也不仅仅停留在单一的政治层面上,而是与文学、学术等文化层面互为驱动的。这种驱动对于文学或学术等文化层面的生成与发展来说,都可视之为一种生态环境。

就文学层面而言,南宋党争就是文学生态中最直接、最活跃的因素。党争犹如决定植物生态的土壤与气候,是文学生态的首要环境因子;在党争影响下的士人命运及创作心态的演变与价值纬度的取舍,则如在特定土壤与气候作用下植物种群的发育与生息,是文学生态的内在因子。文学生态关涉到文学的生成与繁荣、演变与衰落,它是由特定历史时空中多层面的文化活动合力营造而成的。作为环境因子的朋党之争与作为内在因子的创作主体的相互驱动,即为南宋文学生态形成的关键。它所呈现的结构性的生态互动、由互动带来的内在性的精神变化,为考察宋代文学的原生

状态及其命运时所不容回避。

不过,“生态”是自然科学中的一个术语,文学生态的本质与自然界的生态并非一致。作为文化的一个层面,文学是“人学”,文学创作是建立在作家的精神生活、生命意识之上的。所以文学生态虽然同其他生物个体、种群与其环境的关系存在着可资类比的地方,但更为本质的是精神文化领域中诸多层面的交叉与渗透、排斥与兼容。以党争为首要环境因子的南宋文学生态便是如此。当然,南宋党争与文学创作属于层面不同、规律有异的两个精神文化领域,它们之间的交叉与渗透、排斥与兼容,是需要一个中介体从中起作用的;其中中介体就是文人士大夫复合型的知识结构与主体性质,也正是这个中介体赋予了文学生态所特有的结构性互动。

这种互动是以政治为轴心的。因此,在我们的研究对象“南宋文人与党争”中,将会涉及到一个无法回避的古老而又十分陈旧的话题,那就是作家与政治、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也许因为这个话题的古老与陈旧,我们的思维对它似乎变得迟钝了;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政治长期被简单地理解为阶级斗争而引用到文学创作与解读中,使人们对这对关系的讨论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厌倦。厌倦后出现的一个常见现象,就是不少文学艺术家坚信自己的创作与政治无关,也有不少批评者倾心于文学艺术是满足人们审美需要的、超越一切功利目的的特性之中,而不愿谈论作家与政治、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于是,无论在古代文学的研究抑或对当代文学的解读中,作为创作主体的生命情结意义上的政治被淡漠了、甚至被忽略了。

其实,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在总体上,完全不涉及政治的文学或完全不理睬文学的政治都是不可想像的。不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政治动物”之命题的本来意思是

什么,就每一个创作主体来说,他对政治理想的追求,对社会群体的关注,对现实政治的关怀,以及由此生成的政治行为,无法避免地积淀在他的生命情结之中。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表达了这一情结;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主要内涵,也在于此;而西方的政治学家则直截了当地作了这样的判断:“政治行为与冲动是人性与其环境接触的产物”,“政治冲动不仅仅是对手段和目的进行考虑后做出的理智推理,而且也是先于个人的思想和经验,尽管为思想和经验所修正的意向。”^①因此,作为“人学”的文学,难以摆脱政治对它的作用;反过来说,有些文学作品的创作也会影响他的政治态度。所谓“诗可以怨”、“不平则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每个民族或国家而言,执掌政权的人,总是要利用文学的形式来伸张和渲染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也总是要利用政治机遇和氛围来观察与反映社会现实,表现自己的思想情感,这一点,古今中外似乎没有例外。而在南宋文人与党争中所显现的作家与政治、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则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当然,在将要对这个案例的解剖中,我们不会简单地停留在政治与文学关系的线型状态之上,而是将它置于南宋文学生态特有的结构性互动中,考察其原生状态,剖析其内在理路,揭示其生成和发展的历史底蕴,总结其内在规律与特征。

作为参政主体,南宋文人无不具有鲜明的政治人格,而且在政治舞台上,还具有强烈的“士本位意识”,但他们所处的政治舞台充满着激烈的朋党之争。

一般认为,在南宋政治史上,朋党之争的现象并不突出,历时长久也最突出的宋金和战之争与道学反道学之争,不属于党争的范围。其实,与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新旧党争”是北宋中后期政

治的主要表现形态一样,南宋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也是朋党之争;宋金和战之争与道学反道学之争,就是以党争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而就南宋党争的历程而言,则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建炎至绍兴高宗在位的36年。这时期的文人士大夫绝大多数经历过靖康之变,饱受了剧烈的丧家失国之痛;同时又是从北宋末年的“新旧党争”中走向南方,参与南宋政治的重建的,所以又带有无法平息的朋党意识与激烈的党争冲动。因此,这一阶段的朋党之争虽然主要围绕主战还是主和展开,但难以从北宋党争中分离出来。因为无论是主战还是主和,他们都具有以往党争的知识背景与思想意识,也都面临对靖康之变的反思;在反思中,十分自然地燃起往日的党争情结,从而使北宋党争死灰复燃,即便是在和战之争中胜出的秦桧及其相党,在政治与学术取向上,也一反赵鼎的“党元祐”而“主王安石”。所以,可以称之为“后新旧党争”。

二是孝宗即位至宁宗开禧的近40年。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道学朋党”与“反道学党”之争。“道学”一词,在后人整理的宋代学术史中,多数专指程、朱一系的学术思想,在南宋,该词的盛行却取决于党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党争给命名的,是“反道学党”用来指斥政敌的一个专用词汇。在被指斥的政敌中,既有庇护“道学”的宰执侍从,又有极富理想色彩的学术官僚。如道学的倡导者张栻、朱熹等人,在全面挖掘儒家“道统”中的“精义”后,竭力张扬“圣人”之境“天理”,既“以圣人自期”,又主张他人“当以圣人”为准,并据以批判朝政,抨击异己。这与极度匮乏“圣人”的现实世界形成了高度紧张,在高度紧张中出现了强烈冲突。若高宗朝的政争与学术之争虽互为驱动,但非彼此相融,“道学朋党”与“反道学党”之争,则使政争与学术之争表里一致、融会一体了。这一论争萌芽于乾道年间,始盛于淳熙后期,至“庆元党禁”,标志了“道学朋党”的

终结;“开禧北伐”后韩侂胄的被诛,则宣告了“反道学党”的末日。

三是宁宗嘉定以后至度宗朝的近 60 年。随着与金、蒙关系的变化,和战之争也成了这一阶段朋党之争的一个话题。但相对于以往两个阶段,这时党争中的学术之争几乎消失了,绍兴年间“党元祐”的赵鼎、胡安国以及孝宗朝“道学朋党”中的张栻、吕祖谦、朱熹等所张扬的道学,尽管无法真正落实到治国方略中,却被推上了不可动摇的正统的地位;与此同时,朋党之间虽然不时地发生正面交锋,但激烈程度似乎降低了不少,也很少见到“绍兴党禁”、“庆元党禁”中那种残酷的迫害。但另一方面,史弥远、史嵩之、丁大全、贾似道等权相接二连三地出现,而且他们所实施的相党政治变得稳固多了,在稳固的相党政治下,文人士大夫的锐气却越来越少。

不过,无论哪个阶段,都表明了党争是南宋政治与文人参政的主要表现形态;同时又成了南宋文人在多层面文化活动中的一个轴心。那么,围绕这个轴心又有哪些具体表现呢?或者说,在这个轴心上,多层面文化活动又产生了哪些结构性互动?

“国是”的推行,无疑是最为显目的表现。所谓“国是”,就是指“千准万确”的最高国策,也是绝不允许“异论相搅”的高度一元化的专制模式。“国是”一说,在先秦便已出现,但作为政治文化运作中的一种模式,却是从熙宁王安石变法开始实行的。为了排斥政敌、抑制异论,保证新法的顺利实施,神宗与王安石共同定新法为“国是”;也就是说“国是”乃由新法之争引起的“新旧党争”的产物。自熙宁以后,定“国是”、持“国是”,一直成了两宋文人士大夫在政治文化的运作或朋党之争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因为“国是”作为最高国策而存在,绝不允许“异论相搅”,所以在每个阶段的朋党之争中,党争双方都竭力争取定“国是”、持“国是”的权力。易言之,党争需要“国是”,“国是”激化了党争。而“国是”的推行,一方

面给分朋结党与党同伐异树起了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旗号,从而推进了人事上的打击与迫害、文化上的监控与禁锢,朋党之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显得更为突出;另一方面则强化了参政主体的专制文化性格,进而又与党争中的学术之争、用人之争产生了内在的互动。因此在学术层面上,呈现出极度的封闭性,形成了鲜明的排他性学术文化性格;在用人层面上,则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法则”发挥得淋漓尽致,尽情地凸现了党同伐异的政治文化性格。

在多层面文化活动的结构性互动中,另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层面就是文学。不过文学层面上的互动,是既有正面促进,又有负面效应的。南渡以后,在对王安石新法、“新学”的批判与否定,对“新党”、尤其是以蔡京为首的“绍述”朋党集团的误国之罪的声讨与清算中,长期被禁锢的“元祐党人”得到了平反昭雪,另一被严禁的包括苏轼、黄庭坚的文学在内的“元祐学术”,也获得了新生,苏、黄的文学意义与价值得到了全面的阐释与张扬,文学群体随之进行了重组,从而保证了“江西诗派”与“苏轼词派”的兴盛,“道学文派”也相继崛起,各种文体的创作出现了繁荣景象,从而使文学命运从“崇宁党禁”的低谷中走了出来,得到了再造。

然而,南宋文学的繁荣是缺乏持续性的。究其因,同样是围绕党争这个轴心所形成的多层面文化活动的结构性互动所致。譬如:歌功颂德运动此起彼伏,谄诗谀文汗牛充栋,玷污了文坛,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文学命运的走向。但这对于执政者来说,正出于推行“国是”这一高度一元化的专制政治所需;对于创作者来说,则出于因专制政治的压迫而产生适应性变异后的表情达意之需。诚然,谄谀之作在汉代扬雄、蔡邕的笔下业已出现,但在文坛上大量出现,却始于北宋“崇宁党禁”而盛于南宋。其实,谄诗谀文是文学主体内在的、气质的、待时而发的心理与性格的一种外化形态,

南宋党争之“时”便极大地诱发了这一心理与性格。而作为一种舆论力量,谄谀之作的盛行则十分有效地助长了在“国是”中形成的专制政治的肆虐;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观之,谄谀者既成了依附在“国是”这张“皮”上之“毛”,又充当了推行专制政治的党魁之“毛”赖以生存之“皮”。

王夫之曾将高宗时期的文人士大夫概括为两大类:一是“逾其度”者“操必得之情,则必假乎权势而不能自释”,一是“阻其几”者“恒留余地以藏身,则必惜其精力而不能自坚”;前者“其志持之已盈,其气张之已甚”,后者“重抑其情而祈以自保”,二者所患虽异,但“皆本原于居心之量”,殊途同归;缺乏“居心之量”而导致“要以远于道之所宜而堕其大业”的原因,在于“不能据中道以自成”^②。“中道”即“无偏无党”、“无淫过、朋党之恶”的“大中之道”^③;“不能据中道以自成”而“堕其大业”,也就是因“朋党之恶”而不能成就经世济民的大事业。因此,无论是“逾其度”者“假乎权势”,党同伐异,甚至迫害政敌,还是“阻其几”者在党同伐异中遭贬处穷,甚至被迫害致死,都是失去“中道”后相同命运的不同表现形态。王夫之以“朋党之恶”为轴心、以主体心态即“居心”为依据所作的这一概括,其实也适合于整个南宋文人士大夫。这一命运及其表现形态,同时也是文学领域中创作主体的基本特征之一,尤其是“阻其几”者在“藏身”中的“重抑其情而祈以自保”,被转化成了文学层面的主题与价值取向。该取向的功能在于淡化由政治层面的“朋党之恶”带来的悲剧命运,排遣在悲剧命运中身负的畏祸与处穷情累,镇定心志,保持初心,安顿心灵,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学意境。这是文学生态中多层面文化活动的结构性互动所呈现出来文学命运的又一个重要走向。

事实充分表明,以党争为首要环境因子的南宋文学生态,存在

着多层次文化活动的结构性互动;在互动中,既有交叉又有渗透,既有排斥又有兼容,从而决定了文学的生成与繁荣,也影响了文学的演变与衰落。因此,对于南宋文学的观照,仅仅停留在文学是满足人们审美需要的、超越一切功利目的的特性之上,是远远不够的,应扩大研究视野,改变研究方法,考察其生态环境的形成,揭示其结构性互动的历史底蕴。当然,这是一种主观愿望,在即将展开的讨论中,是否具有实际效果,只有靠读者来审判了。

注 释

- ① [英]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第4页(笔者按:文中所引书目的出版单位与年月,详见本书附录,注中恕不标出)。
- ② 《宋论》卷一〇,第201页。
- ③ 《尚书正义》卷一二,《十三经注疏》本,第189页。

目 录

引 论	(1)
-----------	-------

上 编 南宋党争的背景与历程

第一章 从“靖康之乱”到“绍兴更化”	(3)
第一节 “靖康之乱”的政局	(3)
第二节 避让与亡命	(13)
第三节 “最爱元祐”与“绍兴更化”	(23)
第二章 从“赵张之争”到“绍兴和议”	(39)
第一节 “绍兴更化”与“赵张之争”	(39)
第二节 “绍兴和议”与“赵秦之争”	(47)
第三节 “绍兴和议”与“绍兴党禁”	(57)
第三章 从“隆兴和议”到“庆元党禁”	(71)
第一节 “隆兴和议”的形成	(71)
第二节 近幸势力与道学之争	(85)
第三节 道学的崛起与“庆元党禁”	(98)
第四章 从“开禧北伐”到“端平更化”	(127)
第一节 “开禧北伐”与“嘉定更化”	(127)
第二节 “端平更化”以后的朋党政治	(140)

中 编 南宋党争的动力与文化性格

第五章 国是之争	(161)
第一节 “国是”说的形成与内涵特征	(161)
第二节 国是之争与专制文化性格	(172)
第三节 余论：“国是”下的皇权与相权之关系	(190)
第六章 学术之争	(200)
第一节 学术的经世特征	(200)
第二节 学术之争与排他性学术文化性格	(216)
第三节 余论：学术之争与“非历史化”思维方式	(257)
第七章 用人之争	(269)
第一节 君子小人之辨与用人之争	(269)
第二节 用人之争与党同伐异的政治文化性格	(286)
第三节 余论：党同伐异与《宋史》之失	(310)

下 编 南宋党争与文学命运

第八章 文学群体的重组与文学命运的再造	(323)
第一节 引 子	(323)
第二节 “最爱元祐”与“江西诗派”的全盛	(328)
第三节 “崇苏热”与“苏轼词派”的兴起	(339)
第四节 以“吾党”行“吾道”：“道学文派”的崛起	(362)
第九章 高压政治与谄谀之风：文学命运的走向之一	(405)
第一节 高压政治的表现形态之一： 专制文化政策与文字狱	(406)
第二节 高压政治的表现形态之二：	

谄谀之风与谄诗谄文	(426)
第三节 谄谀之风的历史与心理本源	(451)
第十章 畏祸心理与以理遣情:文学命运的走向之二	(471)
第一节 党争中的文人命运与心态	(471)
第二节 “朋党之恶”与“和陶拟陶”	(493)
第三节 结束语	(514)
后 记	(526)
本书主要引用书目	(529)

上 编

南宋党争的背景与历程

徽宗宣和七年(1125),金兵第一次大规模南侵,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替代了以往变法与反变法的矛盾而成为宋代社会的主要矛盾。靖康之乱,北宋灭亡,高宗赵构重建南宋政权后,这个主要矛盾依然没有改变。面对金兵的多次南下,摆在南宋朝廷和所有文人士大夫面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是:坚持抗金、收复失地抑或妥协议和、“屈膝投降”?这一点,既成了南宋政治运转中的一个轴心,又成了南宋文人士大夫政治态度和立场的分水岭。而宋金之间时战时和的局面,则一直维持到了理宗端平元年(1234)蒙古灭金,才告结束,为时一个多世纪之久。

随着南宋政权的建立,建立何种学术思想来巩固该政权的深入实施,是南宋朝廷和文人士大夫又一难以回避的重大政治问题。南渡后,士人对北宋灭亡作了痛苦的反思;在反思中,将北宋灭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和指导变法的“荆公新学”,成了一种主要思潮。于是,高宗在复国后作了“朕最爱元祐”的学术选择,其中主要是二程道学。但由于道学的内倾化,道学人士在高举抗金旗帜时的不合时势,高宗的学术选择并没有真正落实,道学与非道学之间的对抗相当激烈,庆元年间又出现了继北宋禁“元祐学术”以来的又一